



## 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27)

# 扎根于坚实土地上的乡愁

□王 晖 张 娜

在近年来风行的非虚构写作中,梁鸿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作为一名“70后”,梁鸿既是学者,也是作家。多年蹲守象牙塔的她,也曾迷茫、困惑,曾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怀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关系,渴求那种能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回到故乡,回到梁庄,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知那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这不仅成就了《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也体现出梁鸿力求对精神世界进行自我救赎的自觉姿态,更表现出一个富于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当代知识分子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真实乡土的亲历与反思。

### 学者的浓郁乡愁

从乡野走出来的梁鸿,尽管外出求学多年,但家乡始终是她情感的牵挂。20年故乡水土的滋养,使她对乡村生活有着铭心刻骨的记忆、理解和认识。面对当代乡村的破败,梁鸿总有为它做点什么的冲动。同时,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梁鸿深知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面对一个个正在消逝或即将消逝的村庄,回到梁庄,把一个乡土中国的“缩影”真实而形象地呈现出来,是梁鸿的“野心”,更是她的浓郁乡愁。

近几年,梁鸿以家乡河南梁庄为调查对象,在5个月的回乡调查和近两年、十余省市、数百人的采访中,通过对一个个乡村人物的具体描绘,真实记录了他们的生活轨迹,以及乡村破败、荒芜的现状。将近30年间农村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变迁、所面临的危机呈现在人们眼前。《这本书,写梁庄,只是最近30年“被”消灭的40万个村庄的缩影》(温铁军),“梁庄质疑、修正了关于农村的种种通行定见。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李敬泽)这些评论,或许道出了《中国在梁庄》的真正价值。

《中国在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一鸣惊人,收获荣誉满满。之后,梁鸿又沿着梁庄人外出打工的路线,走访十余省市遍访340余人,收集资料达200多万字,讲述梁庄三代农民工在城市谋生的故事。2013年3月,《出梁庄记》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无论是《中国在梁庄》还是《出梁庄记》,都渗透着梁鸿浓郁的“乡愁”。余光中眼中的乡愁,是海外游子对故乡浓浓的眷恋和重回故乡的渴望;梁鸿心中的乡愁,是归乡的女儿对故乡之痛的记录、对现代性和城市化的反思。在书中,作者对当下以梁庄为代表的的乡土中国不是一味简单的“否定”或“肯定”,而是在描摹现象的同时,努力探究其变迁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以及这些变迁对个体生命的巨大影响。“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性追求的负担?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如何发生的?”

在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今天,将“熟人式的”、“家园式的”乡土文化模式替换成“陌生人式的”、“个体式的”城市化模式,会不会过于绝对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使农耕文明迅速解体,我们的“故乡”何去何从?乡村是否真的适合用全球化、现代化的模式来发展?带着这些疑问,梁鸿一步步探寻中国改革进

程梁鸿,生于1973年,河南人。著有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论文集《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巫婆的红筷子——作家与文学博士对话录》等。曾获2009年度《南方文坛》优秀评论奖、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等。

程对乡土文化的冲击。在这里,梁鸿表现出一种沉思者的气质,她的“乡愁”也超越“梁庄”,而成了无数现代人的乡愁。

### 站在坚实的土地上

梁鸿的“乡愁”并非虚妄的想象,而是扎根于坚实土地的忧思。了解真相是现代入精神生活的一种需要。然而,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网络文学异军突起,尽管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但大多是为了迎合快餐消费的需要,穿越小说、历史戏说、言情小说充斥在我们的周围。胡编乱造、毫无逻辑的虚构混淆了我们的视听,赤裸裸的文字描写挤占了我们的思考空间,充斥的浮躁吞噬了我们内心的安宁。另一方面,“文以载道”、“文章合为事而著”的文学传统,也似乎正在远离人们的视线。文学界的浮躁使近年来接地气优秀作品乏善可陈。在这样的情况下,读者更加渴望作家能够揭示现实的真相,渴望有思想深度、有历史意识、有反思精神的作品出现。梁鸿的“梁庄两部曲”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横空出世,给当下浮躁的创作注入一股清新之风。

梁鸿身体力行,“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忠实记录和还原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真实,为广袤土地最朴实无华的小人物群体立言。她深爱这片故土,用一颗真诚而挚爱的赤子之心,生动展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她的文笔细腻朴实,字里行间皆是一份情、一份真,一份时刻接着地气的真诚。在作者的笔下,乡村、农民自己开口说话,讲述他们琐碎的生活、真实的情感和面对时代巨变所带来的精神困顿与迷茫。坚守土地的农民说:“种地虽然免税了,但是肥料、种子、人工在不停地涨价。种一年地下来,也只是落个‘原地转’。”留守儿童说:“我就是爱玩游戏,读书有啥用,将来还不是出去打工?”留守老人说:“六七十岁的老两口,既当爹妈,又当老师、校长,能当好吗?”进城的农民工说:“城市不是我的家,我们终究还是要回去的。”他们的话语里包括许多信息,超出理论总结,也超出我们的把握。读者会从这些口述实录的话语里体会不同的东西。当这些真实而独特的个体自己开口言说时,我们才能真正触摸到乡村的脉搏,感受“故乡”的沦陷模样。梁鸿用另一种方式见证了时代巨变中的乡村之痛。正是这一个个真实而独特的个体,构成了当下最真实的乡土中国。

### 非虚构:“小叙事”重构公共记忆

文学史上有多种范本和模式来表现扎根于坚实土地上的乡愁,梁鸿选择的方式是非虚构。何谓非虚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我以为,非虚构文学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它的非虚构性,或者说是“写实性”。田野调查、新闻纪实、文献价值、跨文体呈现是非虚构文学构件的基本要素。“非虚构”汇集了回忆录、田野调查等方式,不同程度地强调作者身份的个人性、写作的亲历性、文本的揭秘性、题材的猎奇性和叙述的故事性,与现存的报告文学文体有一定差异。

梁鸿在《中国在梁庄·前言》中谈到自己对非虚构创作的认识:“海登·怀特在谈到历史学家所陈述的‘事实’时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认识到‘事实’的‘虚构

性’,所谓的‘事实’是由论者先验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所决定的。那么,我的‘先验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苦难的乡村?已经沦陷的乡村?需要被拯救的乡村?在现代性的夹缝中丧失自我特性与生存空间的乡村?我想要抛弃我的这些先验观念,以一个怀疑论者,对或左或右的观念保持警惕,以一个重新进入故乡密码的情感者的态度进入乡村,寻找它存在的内在逻辑。”在此,梁鸿已经比较清楚地说明了其写作的基本叙述策略,那就是抛弃“先验观念”,不搞“主题先行”,但也不是完全的“有闻必录”,而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材料的重新“编码”。因此,在梁鸿的文本里,个人、亲历、揭秘、故事等要素被一一凸显了出来。

与报告文学等非虚构文体写作不同的是,在《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里,梁鸿不是以宏大叙事而是以“小叙事”折射大问题,以个人化视角诠释社会与人生。

这里的“小叙事”一方面表现为作者对处于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和生存状态的写实,另一方面表现为细节的密布,以至于达到了比比皆是、信手拈来的地步。做“展示者”、不做“启蒙者”也是其“小叙事”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作品中,我们发现,无论是作者作为采访者的举止言行,还是大量的被访人口述,由梁庄的留守老人、孩子、外出打工的中青年人等组成故事和叙述主体,大多不是用“启蒙者”的眼光去居高临下地审视一切、反思一切,而是将这一切作为“展示”——尽管一些展示有时候读来令人心里不安。实际上,在两部作品中,作者的观点和表达的感情倾向比比皆是,只是在以梁庄为代表的乡土中国及其民众、在亲历巨大现实变迁时所表现出来的憧憬、纠结、惶惑、盲目、绝望、希望、矛盾等情绪、行为和认知面前,作者也陷入了矛盾的境地。

如果说,《中国在梁庄》里,作者叙述的着力点是怀着忧虑的心境“展示”当今乡村的一切,那么,在《出梁庄记》中,作者则推进了一步,在她看来,乡村以及遍及全国各地的梁庄打工者所延伸出来的乡村,“都不是与‘我’无关的事物”,“我们应该负担起这样一个共有的责任,以重建我们的伦理”。否则,我们的‘自我’将彻底地失落”。由此看出,梁鸿在写作《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时,并不只是单单回到梁庄,记录“我的亲人”和“我的故乡”,而是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上,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现实变革中的位置,努力展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

梁鸿的作品充满了敬畏与悲悯,她敬畏的是那些时代变迁中顽强生存的鲜活个体,悲悯的是沦陷中的乡村之痛。但悲悯并不是简单的是非对错判断,而是意味着要让时代巨变中的裂痕在当下的公共记忆中复活。她希望经由“个人记忆”来重构“公共记忆”,把一个真实的乡土中国的“缩影”呈现出来,它的痛、它的沦陷、它的明天在哪里?

梁鸿曾说过:“真正的人文主义态度是从自身——‘民族’和‘自我’的双重自身——的经验、体验和伦理感出发,从内部的历史与原点出发,去发现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让文学重回公共空间,用文学的力量重建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构成了梁鸿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原动力。追问我们的历史、忧患我们的时代、祈福我们的民族,使梁鸿的“乡愁”更具博大与深远的意义。

## 那一片风沙吹扬的土地

——读汪泉长篇小说《枯湖》

□张存学

他身上所具有的城市气息又使黑沙窝的人感到了外面世界的光芒。穆刚和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王毛朵在相互吸引中产生了爱。这种爱是一个沙漠姑娘与一个大城市人的相互吸引。

王毛朵淳朴、自然,她是自然之女,没有矫饰,没有故作,正是这种形象使穆刚为其倾心。而穆刚身上的城市气息也使王毛朵心动。穆刚给予王毛朵的不只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提升。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大批的城市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员流向西北地区。客观

### ■创作谈

2012年10月,我和施战军老师在一次会议上碰到,当时他正在进行《梁庄在中国》(刊于《人民文学》12期,后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出梁庄记》)的终审。自然,我们谈起了它。他对我说,你有没有意识到,书中有太多死亡了?我一愣,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更没有察觉到,“死亡”竟是“梁庄”如此正常的风景和如此隐蔽的结构。

确实,开篇有“军哥之死”、“光河之死”,第三章有“贤生的葬礼”,第七章有“金的千里运尸”,第八章有“小柱之死”、“无名死亡”,即使在结尾“梁庄的春节”一章中,也有“老党委之死”和流传在吴镇的神话故事“义士勾国臣之死”。

死亡如此随意而密集,犹如尘埃。生命孱弱地生长,又悄无声息地逝去,悲伤、痛哭、欢乐和点滴的幸福都被黑洞一样的大地吸收。我想写出大地的感觉——整体性、混沌性和蔓生性,想写出人(不只是农民)在其中的卑微和平常。是的,和树叶飘落一样,清晨的露珠一滴一滴地砸向它,把它砸回小柱坟而又柔软的土地中。梁庄,在每一个清晨醒来,又在黄昏中睡去,时间停滞,又长远行进。

但是,如果只有大地,只有人类生命的普遍性背景,而没有社会、文明、制度,没有家、爱、离去——那塑造种死亡的实际因素,那么,生命的存在样态,它内部的复杂性、差异性又会被遮蔽。所以,既站在大地之中,又回到文明和生活的内部,把目光拉回到大地上那移动的小黑点,“人”——如何移动,如何弯腰、躬身,如何思量眼前山一样远的道路,如何困于劳累和幸福,是《出梁庄记》最基本的任务,也是我一个小小说的野心。

回到“梁庄”。梁庄的“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仅仅几天而已,“军哥之死”已经成为“闲话”沉淀于梁庄的言语中,现实变成了历史。军哥已经成为一个被遗忘了的人。梁庄的道德、良心、情感是混沌的、残酷的,但却又有着奇怪的宽容和包容,就像那即将沦为乞丐的清立。他孤独行走在梁庄的边缘,既被遗弃,又气定神闲。如果你是启蒙主义者,你会谴责梁庄的人们;如果你是强调生存法则的自然主义者,你无从解释梁庄这样富于包容性和生长性;如果你是个人主义者,你会说他们如此不平等,只看生,不管死。我不敢做出判断,只能迷惑而犹疑地看着眼前的梁庄,我故乡的亲人们,试图勾勒出其最细微的逻辑和枝蔓。或者,那也是我们这个生存共同体共有的逻辑和枝蔓。

贤义又为什么成为了“算命者”?他真的懂得传统知识,理解传统文明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吗?他那个支离破碎的、混搭的、荒唐的正屋墙壁,似乎彰显着他内心的混沌和芜杂。这样一个“过时了的”、“可笑的”人,他的神情居然有着某种清明和开阔。这些神

## 写作对抗遗忘

□梁 鸿

情从哪里来?你很难辨认清楚。在梁庄,这样驳杂而又难以界定的生命和精神非常多。它们从来都不是清晰的,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又此又彼,既左亦右。你该怎么办?

不只是城与乡的关系,不只是农民与市民的关系,也不只是现代与传统的关系,而是这些关系的总和构筑着梁庄的生活,并最终形成它的精神形态和物质形态。我不想把《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问题化,也特别希望读者能够体会到其中复杂的层面。它不是一个为民请命的文本,而是一种探索、发掘和寻求,它力求展示现实的复杂性和精神的多维度,而非给予一个确定性的结论。

我看重“梁庄”里面的枝末节,刹那的羞涩、无知无畏的坦率、瞬间的凶猛、不肯退去的羞耻、不愿释怀的“无身份感”和那眉间遥远的“开闸”。我喜欢这些“闲笔”,它们附着在梁庄荒芜的场景中,就像那夏天暴雨后的植物,以一种荒凉的方式显示出顽强的活力。我想传达这一世界的内部,它的蔓草丛生、尘土飞扬、忧伤,还有“生活的动力”。没有哪一个生命和场景完全绝望,即使被侵犯的天真而又迟钝的小黑女儿,在经历过那样的黑暗之后,她依然在成长,生命仍然在蓬勃。活下去,就是一种对抗。

但这还不是“梁庄”的全部。《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都有“我”。有论者认为,“不是梁庄要你写这两本书,也不是梁庄人要你写,而是你写这两个梁庄。因为你,你需要它。”是的,“我”需要它,“我”想找到救赎。但“救赎”这个词在这里又是多么高高在上!你必须意识到“救赎”、“忏悔”本身就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想通过“梁庄”来完成“我”的精神重建,这是“我”羞耻的根源之一。无论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梁庄的亲人,还是哪怕只是一个观察者,“我”的身份、位置和叙事姿态都是让人质疑的。

但我还希望能够在文本中如实呈现并探究“我”的存在,因为,惟有通过“我”的眼睛,才能够更加深入地展示出“梁庄”在我们时代和历史中的存在真相,反过来,通过“梁庄”,“我”也看到了“我”自己的历史形象。“我是谁?”“我是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逃离、界定、视而不见、廉价的乡愁、沾沾自喜的归乡、洋洋得意的时尚、大而无当的现代,等等,我们每一个身上都携带着这样的因子。

在《出梁庄记》的后记中,我把“忧伤”和“哀痛”作为这本书的关键词。这两个词本身是恰当的,但一直都是偏内向的、不那么积极的词语,无意中奠定了这本书的基调。但是,选择这两个词并非是想带出无力感,而是想表达一种历史感。

“哀痛和忧伤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但是,如果不能把“我”放回对“故乡”及对“故乡”相关的事物中去审视,我们就不可能拥有富于洞察力的哀痛,也就不可能对抗遗忘。

性,小说中的白骆驼就是人与自然相互尊重的象征。大自然在黑沙窝人的心目中具有神性,戕害自然必得恶报。因此,黑沙窝的人们懂得如何有节制地向自然索取,也懂得怎样向自然馈赠。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和谐被逐渐打破。一方面,人对自然的索取太多,另一方面,自然也在更加广阔的幅度上改变着自己,人类成为这种改变的被动者。人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存成了首要问题。同时,外部的世界观又吸引着人们。黑沙窝人离开家乡已成必然。当搬迁由行政手段主导时,人们的离去变成了一种规模式的远徙,留下的人将面对日益沙化的故土。

此外,汪泉的小说《枯湖》在叙述上讲究可读性,情节环环紧扣、引人入胜。小说中的人物各有各的特点,许多生动的细节描写让人难忘。

事实上,《一方四川滋养一方李白》涉及的某些话题在李白诗歌研究中并不是没有探讨过,但更多的人关注的是重大政治历史事件、重要的生活变化对作者文学活动的影响,对处于相对稳定形态的某些文化因素却重视不够。本书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在李白研究的文化审美体系方面取得了成功。

《一方四川滋养一方李白》以史为经、以地为纬,以李白与四川相关的问题为论述对象。把作家、作品、文学活动、诗人与时代及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相互联系影响和交流以及异同悉数囊括。本书第八章的标题非常明确地告诉读者本书写作的风格——学术著述与泛李白研究的特点成就了本书的双重阅读性质。

《一方四川滋养一方李白》既是对史实的尊重,又是对史实的重新披沙拣金。对某些研究状貌的反拨固然重要,同时更需要研究观念的更新,《一方四川滋养一方李白》作为一部有创新意义的著述,成全了读者的热切深挚的期待。